

街

生隆店



HENANSHANGBANG
ZHONGGUOSHANGBANGCONGSHU

河南位居天下之中，交通便利，
人口密集，是商圣范蠡的故乡，有着
丰厚敦实的商业文化积淀。在国家
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怀庆人以怀药
为依托，武安人凭着自己的睿智，步
入商林，顺应市场需要，艰苦创业，
开拓进取，谱写了一幕幕令人欣喜
的故事。

中国商帮丛书

◎王兴亚著

河南商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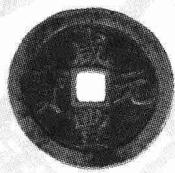
黄山书社



中国商帮丛书

◎ 王兴亚 著

黄山书社



河南商帮

HENAN SHANGBANG
ZHONGGUO SHANGBANG CONGSH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南商帮/王兴亚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7.6

(中国商帮)

ISBN 978 - 7 - 80707 - 711 - 4

I . 河… II . 王… III . 商业史 - 研究 - 河南省 IV .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5448 号

书名:河南商帮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社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7 层)

印装: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8.375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

目 录

武 安 商 人

一、商潮涌动下的穷山村	5
二、武安商人的兴起与乡里分布.....	12
武安商人的兴起	12
武安商人的乡里分布	25
三、武安商人经营项目及其发展轨迹.....	29
武安商人的经营项目	29
武安帮的形成与发展	32
四、武安商人在河南.....	37
五、武安商人在冀、鲁	46
六、武安帮在苏、皖	52
七、武安帮在山陕甘宁	55

河南商帮

八、雄踞关东的武安帮	64
创临泰崭露头角	64
徐和发崛起长春之南	67
锦和盛雄踞长春之北	70
德庆增大显身手	74
德泰兴异军突起	77
众商号并起争艳	79
商关东风起云从	83
九、武安帮在内蒙	85
十、寥寥无几的武安会馆	87
十一、没有帮组织的关东帮	92
十二、武安商人商业资本的去向	97
十三、武安商人的管理与经营	110
各显其能的经营招数	110
商号股份与分红制度	112
人事管理制度	116
店规与纪律	117
商业人才培养制度	118
值得借鉴的从商经验	119
十四、武安商人的生活习俗	123
十五、武安商人的陨落	136

怀 庆 商 人

一、环境与历史条件	145
二、怀商的兴起与乡里分布	157

目 录

怀庆商人的兴起.....	157
怀庆药商的乡里分布.....	159
怀庆其他商人的乡里分布.....	167
三、怀商的神灵崇拜	172
四、怀商在省内	181
五、怀商在省外	188
六、投资创办实业的尝试	196
七、怀帮会馆面面观	201
怀庆会馆浏览.....	201
怀庆会馆的办事制度.....	214
怀庆会馆的特点.....	218
八、怀商与怀药生产	221
九、怀商与公益事业	227
十、怀商与戏曲文化	231
十一、怀商的经营之道	240
“劳苦同于农工”的创业精神	240
产权明晰的管理机制.....	241
独特的营销策略.....	243
以诚信为本的三宝生意经.....	246
帮规与店规.....	250
商业人才培养.....	251
十二、历史的启迪	255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武安商人和怀庆商人，是清代以来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两个商业集团。武安商人是以县定名的，怀庆商人是以府定名的。由明到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被卷入滚滚商潮，走南闯北，艰苦创业，凭借自己的聪明睿智，帷幔运筹，打造自己的理想，实践着自己的追求，为世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诸多的深思。

由明至清武安隶于河南彰德府，1949年8月划归河北省。怀庆府始终为河南的一个府。所以，这里放在一起，分别加以叙述。

武 安 商 人

一、商潮涌动下的穷山村

商人从事商品交易，古代叫作商贾。它与商品交易同时产生。依据其经营方式来划分，可分为行商和坐贾两大类。行商是流动商人，长途贩运是行商的一种形式。坐商是就地开设店铺从事经营的商人。开设商店，俗称坐庄。形式有行、店、铺、庄、栈、坊等。依据其拥有资本的多寡，又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被称作富商大贾。中小商人，一般地说，拥有资本的数量较少，属于小本经营。依据其经营内容来划分，有着众多的行业；既有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经营的商人，又有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地主兼营商业，以及士商、官商、僧商的区分。这些商人，出现在商品流通领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发展。

武安地处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处。远古时代，在这块土地上，就有先人生息繁衍。战国时这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认

武安商人

识,秦、晋曾经在此展开争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苏秦、白起,先后被封为武安君。刘邦建立汉王朝,这里正式建县,名为武安,隶属于魏郡。王莽代汉,改县名为桓安,但为时不久,新莽政权倾覆,刘秀即位,恢复汉朝天下,武安也恢复了旧称。此后两千多年来,斗转星移,王朝多次更迭,但武安县制的地位似乎没有多大变化。

关于武安县的地域,明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武安县志》说,县在彰德府西北60里,其境东西延100里,南北袤180里,东至广平府邯郸界牛照村28里,西至本府涉县马铺80里,南至本府磁州(今河北磁县)流泉铺50里,至顺德府沙河界奚家庄50里。按照今日之行政区划,其四至为:东临邯郸、永年,以紫金山为界;南与磁山、峰峰矿区毗连,以鼓山、天井寨山、南大垴为界;西与涉县、山西左权县接壤,以青阳山、万寿山、十八盘、青崖寨为界;北与邢台、沙河市相连,以摩天岭、老爷山、梅龟山、皇母山为界。东西长555公里,南北宽605公里,西北至东南长65公里,总面积为1811平方公里。

今之武安城是明代奠定的。它的构筑似乎也不同于一般的县城。有内、外二城。内城建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长方形,周长3里许,有西北二门,门上有城楼,北门曰紫金楼,西门没有名号,不设南门,据传是武安城内没有人考上状元,等有人考上状元了,再开南门。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内城里有大街小巷和坊20余处,东西南北四角各有角楼。外城建于崇祯七年(1634年),周长13里许,设城门9处,除设南门曰南薰门,西门曰坤贞门,北门曰拱极门,东门曰聚金门外,又设菜园门、金山门、沙沟门、胡顺门,以方便民众出入。城内街道16条,宽3至5米。商业多集中在南关街。这里商业繁盛,素有“小天津”之称。

大约在11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原有经济的布局。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跃居国内首位。而率先发展起来的中原地区,则进入滞缓时期,落在了

一、商潮涌动下的穷山村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后面。14世纪以来，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西北与东北地区的经济，由于与先进的文化接触、交流，有了新的发展。进入15~16世纪，在神州大地上，南京、北京、天津、杭州、宁波、上海、苏州、扬州、临清、济南、武昌、芜湖、西安、太原、南昌、广州、兰州、宁夏（今宁夏银川市）等城市商业一派繁荣。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一批商业市镇拔地而起，一股弃农从商的浪潮滚滚而来，易地经商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在江苏苏州，弃农从事工商业的人数三倍于前。浙江业农的人少，务商的人多，杭州府居民半数以上都在经商。宁波人十分之七在外经商。龙游商人携带资金外出，足迹及于秦、晋、滇、蜀诸省，他们来来往往，相距万里之遥，如同比舍。江西抚州居民为商者达三分之一。在北方，陕西商人西入陇蜀，东走齐鲁，泾阳县人在外地经商者占十之八九，三原人也有十分之七在经商。以地域为特征的区域商人，诸如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浙江商人、龙游商人、江西商人等逐渐结成帮口即商业集团，展现在黄河上下和大江南北的市场上，据有人统计，明后期全国拥有资产50万以上的富商共有17家，其中山西3家，徽州2家。他们以其在商品流通中的巨大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朱明王朝的执政者，没有开放意识。他们习惯于传统的经济模式，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继续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导向上的失误，使得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不能持久地发展下去。在晚明的数十年间，由于执政者的倒行逆施，中国经济陷于衰微破败状态，激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克北京，结束了朱明王朝的统治。他在北京皇帝宝座上坐了紧紧张张的40天，就被东北崛起的清王朝驱逐出京。接着清朝定鼎天下，统治全国，完成了改朝换代。满族贵族爱新觉罗氏成为国内各族的皇帝，但在经济政策上未有大的调整和改变。由于大规模的国内战争结束，人民重新

武安商人

回到生产上来。清王朝实行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日渐得以恢复。百年之后的乾隆、嘉庆年间，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兴起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局面。与明代嘉靖年间相比，波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出现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城镇，而且内地乃至边疆地区的城乡集市贸易也空前活跃起来。传统的所谓士农工商的经济模式受到了冲击，重农抑商，视商业为末业的观念也失去了约束力，商业与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业致富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岁月里，重农轻商这种习惯势力持续了千余年之久。商业和商人不被重视甚至被看不起。商人经营的收入被视为不正当的欺诈行为。尽管无数商人通过自己的经营成为富有的人家，过着优裕的生活，富拟公侯，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他们的正当经营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直到 14 世纪，在朱元璋制订的《大明律》里，还是将商人置于低农民一等地位，甚至立法规定他们不能穿丝绸衣服。更可悲的是，朱元璋还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写进《大明律》里，让其子孙世世代代都要信守遵从。但到了后来，人们似乎并不太顾忌这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农村人口成群结队向城镇流动，在那里找活干，或做起买卖来。不少地主、士人和官吏看到经商有利可图，经商能够致富，也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各地城镇上非农业人口日益增多，商人的数量在迅速增长。

14 世纪以来，中原地区的经济不如江南发达地区，可也不能不受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大约到了清康熙以后，这种正在涌动的商潮，也以锐不可当之势冲进了河南城乡。开封的朱仙镇、南阳的赊店镇、商水县的周口镇、滑县的道口镇被称之为四大名镇。

朱仙镇位于开封城西 45 里的贾鲁河畔，地处水陆要冲。陆路从开封向西，经朱仙镇南通湖北湖南和两广，水路汴河从开封南下，经朱仙镇向东汇入颍河、淮河、蔡河，与江南通航。在它的极盛时期，镇周长 20 里，有人口 4 万户，20 余万口。贾鲁河纵穿镇内，

一、商潮涌动下的穷山村

将该镇分成东西两部分，称之为东镇与西镇。大石桥和二板桥又将东西两镇联在一起。城内东镇杂货街多营南北杂货，曲米街多为米麦商铺，油篓街多油业商店，炮房街多为爆竹作坊；西镇估衣街多经营估衣、当铺，京货街多为苏广时货，铜货街多为铜器作坊，顺河街、西大街为普通商店。乾隆、嘉庆时期，镇上商铺有 20 余类，400 余家，为河南中部最大的贸易中心。在河南中部集市上交易的商品，通过贾鲁河南下入淮河，再与长江接通，将河南集市上交易的商品运往东南各地，再将江南的货物运往河南。镇上业商的不仅有本地人，而且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甘肃商人、安徽商人和福建商人，山西商人还在这里开起了票号。

周口镇（今河南周口市）位于颍河、沙河、贾鲁河的汇合处。明初只是个小村，永乐年间沙河南岸出现一条子午街，与北岸的永宁集相对。到了万历年间，三岸对峙，市场相连，商业渐渐发达，设有茶、麻、杂货、饮食、中药等店。清初周家口为附近粮油棉麻及毛制品的交易场所，后又开设了大渡口、小渡口、上下齐埠口、新渡口等埠口。康熙九年（1670 年），原设在淮宁县的陈州管粮通判移驻于周家口，从此成为市镇。乾隆十二年（1747 年）周口镇人口已超过 7 万之数，街道纵横，沿及淮宁境，周长十余里。有人描述它是“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集之薮。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这里是河南中部地区的商品集散地。河南中部集市上交易的商品，汇集在这里，通过贾鲁河南运至此，再由沙河南运，与淮河相接，发往全国各地。

赊店镇即社旗镇（今河南社旗县），位于赵河和潘河会合处。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建集，名兴隆店。雍正二年（1720 年）形成横跨南北的街道，乾隆年间发展成为长 3 里、阔 4 里的豫南巨镇。嘉庆至同治年间达于鼎盛。城内商贾林立，按行业分街道为铜器、瓷器、山货、骡马、牛行等 72 街。人口盛时达 14 万。镇上商

武安商人

家门类齐全,铺面相连,棉业、粮业、油业、盐业、药业、酒业、杂货业、京货业、木业和纸业称为十大行,银业、铜业、烟业、丝绸业、鞋业、帽业、染坊业、铁业、食品业以及竹业、皮货业、山货业等称为十小行。其中运输业 48 家,日夜装载不停,仅恒泰一家,日停货船百艘,日吞吐货量千吨。棉花日成交额 10 万余斤。

道口镇在豫北滑县境内,地处水旱码头,东西长 2 里,南北宽 5 里,纵横 12 街,72 条胡同,四面 7 个城门,水门 2 个,有九门相照之称。每天卫河上往来船只在百只以上。镇上商贾云集,盛时商号近百,从商人数上万,以经营铁业、铜业、酿酒业、布袋业四大行业著称,是豫北商品重要的集散地。

清末民国初年,清化镇、紫荆关、漯河湾相继发展成为河南商品集散地。郑州更是一跃成为国内重要的商业都市。

武安境内多山,地势西北部高,海拔在千米以上。西部、西南部、北部岗峦起伏,太行山余脉,纵横绵延,其主干摩天岭,屹立西北,山峰险峻,岗峦叠障。南部鼓山耸立,形成天然屏障。东部地势低下,东北尤低。山地与丘陵各占半数。唯中部洺河两岸有局部小平原,称武安盆地。地形复杂。这种自然条件为它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使它非但远不及于江南经济发达地区,也不及当时河南经济发达的城镇。但是,在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之时,武安也不是世外桃源。只不过是迟来了 200 余年。显然这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缘故。不管怎么说,在乾隆年间,商潮已以无法抗拒的冲击力冲进了封闭式的武安山村。

这种发展带来了武安农业的变化。由于该县地多沙田,适合棉花种植,且种棉比种粮收益看好,所以由明至清,棉花种植面积持续扩大,至民国初年,棉田达 6 万余亩。农民纷纷改粮田为棉田。这是历史的进步。但这一进步,并不意味着武安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而同一期间,武安的耕地并没有多大增长,土壤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境内多山,可耕地本来就少,再加上土地瘠

一、商潮涌动下的穷山村

薄,按三等划分,上等地仅 272 顷,中等地 2777 顷,下等地 7115 顷,总计 10165 顷。农业产量长期徘徊不前。同治四年(1865 年),武安农业丰收,粮食亩产:麦 4 斗,谷 1 石,黍稷 1 石 2 斗,高粱 9 斗,交草 6 斗,杂色豆 5 斗(每斗 13 桶半)。直到民国初年,这里最好年份粮食产量:谷每亩收 200 余斤,麦每亩收百余斤,玉蜀黍每亩收 150 斤,绿豆每亩收百余斤。至于歉收年景,那就不好说有多少了。人们通常将这种情形称为地不养人。而人口则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却在持续迅速增长。乾隆元年(1736 年),户为 24565,按照每户 5 口计算,人口在 12 万人以上。至民国 17 年(1928 年),武安户数为 70639 户,人口为 365491,其中男 207419,女 158072。200 年间,人口增加了 3 倍。人均耕地由 8.47 亩下降为 2.78 亩。再加上粮田面积日益减少,在这里,人口过剩的压力造成广大农民实际生活的日益下降。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很快被增长的人口所吞没。吃饭问题成为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摆在武安人面前。